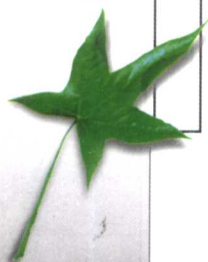


ZHONGQINGNIAN JINGJIXUEJIA WENKU

中青年

经济学家文库



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方式比较

——以中俄改革战略演变为背景的分析

刘文革 / 著

JINGJI ZHUANGUI YU ZHIDU BIANQIAN
FANGSHI BIJIAO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青年经济学家文库

经济转轨与制度 变迁方式比较

——以中俄改革战略演变为背景的分析

刘文革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吕 萍 陈 静

责任校对：徐领弟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邱 天

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方式比较

——以中俄改革战略演变为背景的分析

刘文革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汉德鼎印刷厂印刷

德力装订厂装订

850 × 1168 32 开 11.25 印张 280000 字

2007 年 6 月第一版 200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 - 7 - 5058 - 6215 - 9/F · 5476 定价：21.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实际上存在不同路径，或者说有不同的改革战略，大体上分为渐进式改革（以中国为代表）和激进式改革（以俄罗斯为代表）。尽管国际、国内学术界和其他人士高度关注、研究和评价不同国家的不同的改革战略，但是，实际上我们还很难对不同的改革战略的长期效应作出判断。而且，仅仅依据改革的短期绩效评价不同改革战略的优劣，可能是不准确的，也难以很好地理解和揭示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规律。不过，我们还是有余地深化和拓展对转轨国家制度变迁的研究，使认识更加深刻一些。刘文革博士在辽宁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的主要成果就体现了这一点，其成果成书为《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方式比较》。他研究这一课题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深入分析制度变迁的内在过程而深化对转轨国家改革战略的认识。阅读以后，颇有收益。

首先，作者试图构建一个新的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框架，而且确实体现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根据制度变迁的起因、主体行为和利益矛盾的作用关系，可以把制度变迁划分为两种基本的类型：规则内生性制度变迁和规则外生性制度变迁。制度规则的

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方式比较

“内生演化”是指在一个特定的经济系统中，由于经济条件变化引起的对一系列新制度规则存在内在需求，导致制度发生的演化，这种演化往往会使制度系统趋向新的均衡；制度规则的“外生演化”是指由制度供给主体通过制定一系列制度规则推动另一主体或群体的制度结构发生改变，并使其制度趋向新的均衡；相联系的制度变迁“适应性效率”应包括两个方面：内生规则适应与外生规则适应；由于制度的内生规则本身就是对新制度需求而作的“自适应”调整，因此，规则内生的制度变迁更容易达到或接近制度安排的适应性效率。相反，规则外生性制度变迁，主要依赖制度变迁主体从经济系统外部设计和推进新制度结构，显然容易对制度的需求判断失误或者供给制度扭曲，从而导致制度安排的非适应性，也就难于达到或接近制度安排的适应性效率。

其次，作者并没有停留在理论的逻辑推演阶段，而是结合中国和俄罗斯改革的实践进行实证阐述。作者指出，前苏联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个外生规则制度变迁过程。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进程中，制度变迁方式则迥然不同。中国改革战略的演变大体经历了行政性分权、增量改革、整体推进三个阶段。在对各个阶段的改革内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分析和概括了中国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变迁方式。指出中国改革战略由理论争论到实践探索，由实验失败到成功，由具体谋划到果断决策，中国的改革实质上是内生规则相机抉择制度变迁。

俄罗斯激进改革目标虽然是向市场经济过渡，但由于传统体制根深蒂固，在没有市场经济发育的情况下，政府参照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按照西方经济学和西方经济组织所设计和推荐的一揽子改革方案，自上而下推行。把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模式强加于社会、基层企业和个人，使其不得不被动地接受。这期间没有

经过企业和个人的自主“实验”，也没有经过任何的“创新”试点。这种制度模式是否适合于俄罗斯的国情，全凭政府的主观臆断。这说明俄罗斯的激进改革，是典型的外生规则强制性制度变迁。

最后，作者大胆地提出了下一步中国改革的推进方式，即所谓的实行强制性均衡推进战略。他认为，中国改革到现阶段，已经形成各种利益集团，推进改革涉及到利益的重新分配，改革已经基本上属于非帕累托改进，确实是需要一些外力来推动；政府有必要学会引导各种社会力量或群体进入有序的轨道，以便相互沟通、谈判，化歧见为共识，形成可行的一揽子改革方案，自上而下强制性均衡推行。

即使按照作者自己的逻辑，对基本理论的梳理和理论的总结还显得粗略；对一些实证方法方面把握和论证也显得简单，一些观点能否成立，还需要更好的论证。但是，他确实有自己的研究，这些研究深化了对制度变迁实践的认识，是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当然，我不一定同意作者的观点，对他关于不同国家改革战略的评价也持保留态度，不过不影响我对他研究价值的肯定。

黄少安

2007年3月1日

内 容 提 要

尽管对改革方式的研究连篇累牍，但将改革方式的研究等同于制度变迁方式的研究会使其流于表面化。本书在对已有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方式理论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新的分析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并在这一框架内提出了中国和俄罗斯两种新的制度变迁方式模型。同时本书根据这一模型，研究了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引致的不同的改革绩效。本书的论点通过对两国不同的改革战略和不同的产权制度安排进行经验分析而得以实证说明。

第1章是文献回顾与综述。本书对前人研究的成果作了比较详尽的回顾，同时也作了相应的简要评论。

第2章是对制度、制度变迁及其方式理论进行总结。新制度经济学在“需求—供给”的框架内，把制度变迁方式划分为基本的两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演化经济学强调经济变迁动态演化过程。而进化博弈论的制度变迁理论，将静态的均衡分析和动态的演化分析结合起来，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进化博弈论作为工具，分析了社会习惯、规范、制度或体制在历史中变化的因子，认为社会体制是由历史的初期条件以及过去的环境变化过程、社会中进行的实验、政府的介入以及同异文化的接触等因素决定的。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的以“自由秩序”为基石的对制度变迁的本原性解释，则是对制度的自发性演进规律所作的细致描述。

第3章本书根据制度演进的发生机制，提出了制度变迁方式

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方式比较

理论假说。由于一项新的制度规则可以是自发生成的，也可以是人为的主观刻意设计的结果。据此，本书把制度变迁划分为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是内生规则制度变迁；另一种是外生规则制度变迁。与此相联系的制度变迁“适应性效率”应包括两个方面：内生规则适应与外生规则适应。由于制度的内生规则本身就是对新制度需求而作的“自适应”调整，因此，内生规则的制度变迁和演化更容易达到或接近制度安排的适应性效率。

第4章本书首先对转轨国家变迁方式与制度变迁效率进行了全面分析和阐释，接下来从中俄改革战略的演变进一步分析两种制度变迁方式和制度变迁轨迹。中国改革战略的演变大体经历了行政性分权、增量改革、整体推进三个阶段。中国改革战略由理论争论到实践探索，由实验失败到成功，由具体谋划到果断决策，中国的改革实质上是内生规则相机抉择制度变迁。俄罗斯激进改革由政府设计改革模式，自上而下强制性推行，其间没有经过企业和个人的自主“实验”，也没有经过任何的“创新”试点，新制度模式是否适合于俄罗斯的国情，全凭政府的主观臆断，这说明俄罗斯的激进改革，是典型的外生规则强制性制度变迁。

第5章探讨中国产权改革政策的内生决定过程。针对转轨时期中国对国有经济存量改革和私营经济的发展过程，说明中国由紧到松的制度变迁的内生规则演变规律，同时揭示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和行为。从中得出结论：当私营经济与其他非国有经济达到足以支撑改革国有企业的规模时，政府承担最小的风险，使体制改革自然过渡到以国有企业民营化为重点的新一轮制度变迁过程。

第6章主要探讨俄罗斯强制实施的产权制度改革过程、效果。通过对俄罗斯十年来的企业和农村产权制度变迁过程的考察，俄罗斯产权没有实现预期的改革目标。这和俄罗斯的“外

生规则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有关。同时，本书针对俄罗斯十余年来产权改革形成的“内部人控制”的锁定效应和非效率性的路径依赖和演化进行了分析说明，并对俄罗斯农业产权变革的轨迹和制度变革的效率进行综合分析和考察。

最后第7章是本书的结论。制度变迁划分为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是内生规则制度变迁；另一种是外生规则制度变迁。中国的渐进改革战略实质上是内生规则相机抉择制度变迁；俄罗斯的激进改革则是典型的外生规则强制性制度变迁。由于制度的内生规则本身就是对新制度需求而作的“自适应”调整，因此，内生规则的制度变迁和演化更容易达到或接近制度安排的适应性效率。通过对中、俄两国产权改革内容演变分析，本书进一步证明中国的规则内生性制度变迁的效率性，以及俄罗斯的规则外生性制度变迁导致经济改革不成功的原因所在。同时本书认为制度变迁方式是随着经济制度结构的变化而适时调整的，俄罗斯在21世纪初开始以渐进的、审慎的改革方式来代替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方式，使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借鉴了中国的改革方式。而中国目前在改革中遇到的新问题、新矛盾也必须对制度变迁方式进行调整，而这种调整的方向应当是整体性的、强制性的，这一点我们又可以对俄罗斯的制度变迁方式中的积极因素有所借鉴和启发。

目 录

导论	1
1 研究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方式的重要意义	2
2 研究内容和本书的结构	7
3 分析范式和研究方法	11
第1章 文献综述	15
1.1 关于转轨经济学的若干问题	15
1.2 经济转轨的制度观点评述	27
第2章 制度、制度变迁及其方式的基本理论	39
2.1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与制度分析框架	39
2.2 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	45
2.3 利益集团理论与制度变迁	63
2.4 制度变迁方式理论总结	68
第3章 制度变迁方式理论综合与创新	82
3.1 制度变迁方式理论创新	83
3.2 制度的适应性效率、自增强机制与制度	

变迁方式	106
第4章 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方式概括	117
4.1 转轨国家制度变迁的本质与制度变迁方式概括	117
4.2 转轨国家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绩效	136
4.3 从中、俄改革战略的演变透视制度变迁方式	150
第5章 中国产权改革的经验	198
5.1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198
5.2 私营经济的制度变迁过程	216
5.3 农村经济与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变迁	226
第6章 俄罗斯的产权改革经验	241
6.1 俄罗斯的所有制与企业产权制度变迁	242
6.2 所有权制度、治理结构及绩效	254
6.3 特殊企业组织：金融工业集团	272
6.4 俄罗斯的农业私有化及其绩效	282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306
7.1 俄罗斯的改革战略调整与经济发展	306
7.2 中国的改革战略与制度变迁方式调整展望	314
参考文献	326
后记	343

导 论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什么是制度变迁方式？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Douglass C. North, 1994）的定义为：“制度变迁是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过程；实现这一过程的方式就是制度变迁方式。”这一定义过于笼统，因而没有很好地定义制度变迁方式。杨瑞龙（1995）指出，所谓制度变迁方式是指制度创新主体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所采取的制度变迁形式、速度、突破口、时间路径等的总和。本书认同杨瑞龙的定义。并进一步归纳为：制度变迁方式是指制度创新主体为完成一定的制度变革内容，达到一定的目标，采取的制度变革行为、形式、速度、路径等的总和。研究制度变迁方式就是要回答新的制度规则是通过什么方式产生，如何被实施的，它又如何影响到制度结构的演化和形成。这里的规则一般来说是指“正式规则”。一个国家选择了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实际上对制度变迁内容、制度变迁轨迹乃至对制度变迁绩效有深刻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制度变迁方式选择十分重要。为了不至于引起混乱和研究问题的集中，本书有必要对改革方式和制度变迁方式进行区分。在已有文献中，改革方式和制度变迁方式对于转轨经济国家来说，其含义是相同的，指的是激进或渐进式改革。由于这两种方式实际上指两种不同的改革战略，它是包括改革内容、改革过程，甚至包括改革性质的统称。如激进改革更多的意义是

指以实现经济的“自由化、稳定化、私有化”为内容的改革和其过程。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两种改革方式看作是更为广义的制度变迁方式，或称之为改革战略更加准确。^①而本书定义的制度变迁方式为狭义的制度变迁方式，本书的研究强调的就是这种狭义的制度变迁方式。

1

研究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方式的重要意义

为什么要研究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方式？本书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的：

(1) 转轨经济学要描述和回答转轨国家的制度结构是如何发生和实施的。

以研究制度变迁而闻名的诺思曾经在一篇经典著作中指出，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面临几个现实问题的挑战，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考虑正式规则是怎样发生变迁的”，尤其转轨经济国家的正式规则。他还举例说，“比如在俄罗斯，许多正式规则都发生了变化，但是却不存在一个与这些正式规则相一致的实施机制以及相应改变了的行为习惯，从而产生了较大的混乱并导致了今天的局面。”^②

的确，一批致力于转轨经济学研究的学者，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若干经验性的共识。其中一个重要的共识是，制度建设对经济转轨至关重要。尽管激进改革也强调了制度建设。

① 为了避免引起异议，在以下论述中称之为改革战略或简称为激进改革、渐进改革。

② 这是诺思 1998 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届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年会上的主席演讲中阐述的观点。见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等著：《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中文版），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6～17 页。

但是，激进改革战略把重点更多地放在立法以保护私有财产、股东和债权人的权利等方面。而渐进改革战略对制度建设的理解更加全面，它不仅包括法律和金融体系的变化，也包括执法条件，政府组织结构的改革，以及自我实行的社会规范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渐进改革战略的经验对制度建设的诠释是，市场发展的最低限度的制度基础从一开始就必须具备，因为它们规定了游戏规则从而限制了不希望出现的个人行为，降低了不确定性。适当的制度必须通过反复尝试不断摸索来发展，必须随时间的演进向更完美的制度进化发展。更完美的制度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引进，恰恰是因为制度不仅仅是一组法律条文。而激进改革战略坚持以不妥协的方式来彻底打碎旧机构，直接以最理想的制度取而代之，这其实就是只把制度建设理解为一系列法律、政策条文的简单推行。

另外，激进改革战略强调，只要价格放开、政府不干预市场，市场制度就会自发地发展起来，它同时还强调，必须迅速实现私有化以防止资产流失，必须尽可能迅速地关闭不盈利的工厂和企业。而渐进改革战略强调市场的制度基础建设，它主张对国有企业，在考虑政治约束的条件下，限制和逐步缩小国有企业规模，硬化预算约束。也就是说把重点更多地放在发展壮大新的私有部门、民营部门以及其他的所有制企业的发展上，并逐步使国有部门的经济比重逐步缩小。

上述对制度建设理解上的差别，导致了若干重要转轨领域经济政策着重点的差别，也就成为导致改革效果差别的重要因素。经济转轨不但帮助人们加强了经济学思维关注点的转变，而且重新激发了对市场经济中不同的组成制度的相互作用和互补性思考的兴趣。

这种对制度建设的思考和研究其实就包括对制度变迁方式的研究。因为这一方面在制度建设中，很大程度上受制度变迁方式

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转轨经济学还没有深入研究转轨经济进程中制度结构是如何发生和实施的。^①因此,对于转轨国家发生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制度变迁,从经济学现在所能达到的高度来说,能描述这样一个制度变迁已经具有国际文献价值,如果要解释它更要依赖于理论上的创新,而这种创新更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 从研究制度变迁方式入手,能更好地把握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规律。

两种不同的改革战略优劣问题一直是国际、国内学术界关注和争论的热点。从改革的绩效角度出发,一大批学者对两种改革战略进行比较研究,而讨论的焦点问题是究竟两种改革战略孰优孰劣?正如著名转轨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的研究总结,通过理论的论战,国内外学术界对两种改革战略导致的不同经济绩效已有多重解释和观点。这些见解和观点无疑对我们认识转轨国家的改革实践有深远的意义。但是,仅仅从改革的绩效出发探讨两种改革战略的优劣,不能很好地理解和揭示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规律,更不能从深层次上很好地把握其制度变迁过程的丰富内容,因此,对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进行研究应有新思路,这种新思路之一就是通过对制度变迁方式的研究,深刻认识制度变迁的内在过程。

尽管改革性质不同,但激进改革战略和渐进改革战略的内容大体一致,那就是都朝着市场经济方向改革。激进改革战略强调宏观经济稳定,渐进改革战略也是把经济运行的稳定当成重要的改革前提,并且一直贯穿改革的整个过程,而且从改革实践来

^① 热若尔·罗兰指出:“转型研究不仅加强了现存的制度观点,而且开始开创新的研究领域,例如以演进观点为指导的制度变迁动态学。它还强调了对给定制度的政治支持的重要性,以及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相互作用的动力是如何使制度演变的。”参见热若尔·罗兰著:《转型与经济学》(中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看,渐进改革战略取向的国家对经济的稳定性控制一直优于激进改革国家。激进改革战略强调经济自由化,渐进改革战略也是以放松国家控制、经济主体取得独立的经济活动权利为主要改革内容。近年来的资料显示,从市场化发展程度来看,渐进改革国家和激进改革国家并没有太大差别。从实践来看,中国加入 WTO 和众多国家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一点,虽然中国并没有提出中国改革就是要使经济自由化,甚至一度反对资产经济自由化的意识形态,但是中国的确在经济自由化方面并不比明确提出经济自由化国家的进程要差。激进改革战略另一核心内容是私有化。而渐进改革战略反对私有化,这也是两种改革战略最大的区别,但是,我们换一个比较宽泛的角度思考,就经济非国有化而言,两者也无大的差别。一个比较惊人的相似是,据 1999 年的一个统计资料显示,非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俄罗斯和中国都在 72% 左右。^① 现在两国的国有经济比重下降也都已经将近达到了一定的合理范围。

既然市场化改革内容(排除改革性质)趋同,而且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从实践来看也不存在速度上的较大差异,那么探讨两种改革战略的差异就要从其他方面寻找原因,比如改革的政治约束、初始条件、经济结构,改革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差异等。本书认为这些因素虽然重要,但解释两种改革战略差异的一个更重要的角度就是从制度变迁方式上着手,只有回答了转轨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在既定的现实约束条件下,正式规则是如何实施的,由此影响到制度结构如何演化,才能更好地把握和理解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规律。

(3) 对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实践具有重大的启发性意义。

^① 中国非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贡献度是根据樊纲(2000)的测算;俄罗斯的指标来源于俄罗斯统计(2001)。

对制度变迁规律的深层次、细致研究的一个重要角度就是从制度变迁方式入手。因为制度变迁方式选择影响制度结构的产生及其演化,进而影响到制度变革的效率。例如,我国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一些改革举措的出台,都伴随着特定的“方式”。改革最初东部地区改革开放的大胆“实验”和“实践”,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制度结构,并且这些新的制度安排具有了不断自我完善和创新的机制,也成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源动力。相比之下制度变革滞缓的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制度演化也成为简单的“复制”和“模仿”。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制度创新差异,进而影响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变迁方式。一个大胆的敢于突破旧秩序和一个保守的或受各种经济环境和制度变革条件约束的差别,其实就是制度变迁方式的差异。

再有,近年来在我国的改革过程中,随着改革措施的不断出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具轮廓。但是,从深层次看,改革既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也是一个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正如樊纲所说,围绕体制改革,特别是没有完成的体制改革,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些机制来适当地抵消市场体制本身带来的新问题,这时一定会存在大量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只要改革就会存在阻力,过去的改革是政府放权让利,具体的企业、地方政府、其他利益集团都可能是受益者,因此改革的推进比较容易。现在,问题是利益已经下放到各种利益群体,推进改革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会导致某一个集团利益受到损害。因为改革涉及一些既得利益,确实是需要一些外力来推动。^① 这种推动涉及

^① 樊纲还明确指出:用某种政治权力突破来自利益集团的阻力,需要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魄力。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就是政客永远是附庸于一些既得利益,而政治家的作用是打破一些既得利益。上述这些观点参见樊纲:《当前主要问题在于市场化改革不够深入》,载于2006年4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